
传播符号学 ● ● ● ● ●

波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奥运会*

魏 伟

摘 要：波德里亚是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学者之一。运用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商品系统和消费社会理论，可以清晰地发现奥运会的明星崇拜和“失败者凝视”；他的“他者”理论和去符号化观点可以让人们理解和洞察西方体育中心化的思潮；他的“致命策略”和对暴力的观点是考察奥运会球场软暴力的重要理论基础；受他的理论影响推导出的“伴随文本”诸概念和“伴随文本执着”可以用来解释奥运会的许多伴随文本现象；他的“超真实”理论在奥运会的电视和新媒体传播领域依然适用。

关键词：波德里亚，奥运会，符号政治经济学，后现代

Examining the Olympics through Baudrillard'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Wei Wei

Abstract: Jean Baudrillard is one of the core theorists of postmodernism. This paper focuses on his theories of the commodity system and consumer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国际传播”(2020JJ003)的中期成果。

societ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he cult of the celebrity and the gaze on the losers at Olympics. His theory of “l’autre” and opinion on desemiotisation have provided insight into the Zeitgeist of centralisation in Western sports. His “fatal strategies” and standpoints on violence are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vestigating soft violence in the Olympic arena. Concepts crea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theories, such as the co-text and co-textual obsession, could be used to illustrate many co-texts of the Olympics. Moreover, his theory of the “hyperreality”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communications at the Olympics.

Keywords: Baudrillard, Olympic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postmodernism

DOI: 10.13760/b.cnki.sam.202002008

让·波德里亚被誉为后现代主义左翼学者中“具有领袖地位的”（Best & Kellner, 2002, p. 111）、“学术界的吉米·亨德里克斯”（Levin, 1996, p. 25）、“高级牧师”（Willis, 1990, p. 152）和“变装皇后”（Ashley, 1997, p. 49）。他还被称为“过去20年里可能是最具挑衅性和最富争议的社会理论家”（Giulianotti, 2004, pp. 225 - 239）。他提出的“致命策略”“符号交换”“仿像”“超真实”和“内爆”等理论深刻影响着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诸多层面。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诺里斯认为“过去30多年时间里他游历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中，等待着这条路的尽头”（Norris 1992, pp. 11 - 31）。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他是“终结现代性和将其带入后现代性的社会与历史新阶段的先驱”（Kellner, 1989, p. 94）。

波德里亚的早期理论深受卡尔·马克思、罗兰·巴尔特和让·保罗·萨特的影响。从《忘记福柯》一书开始，波德里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颇富法国批判精神的思想体系。波德里亚的诸理论为学者们厘清后现代社会中的诸多“怪现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也因观点偏激布下了不少理论迷局。本文尝试运用波德里亚的诸理论对奥运会的诸多文化现象展开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冀望获得相对明晰的结果。

一、消费社会语境下的奥运明星崇拜和“失败者凝视”

商品社会语境下的奥运会跟过往相比有较大的变化。早在1984年洛杉矶

奥运会后，波德里亚就指出，“奥运会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行为艺术，对国家的自我庆典的集体参与……奥运会的一切都离不开广告，所有都情绪高涨，所有都很纯粹，百分之百的广告活动”（Baudrillard, 1986, p. 58）。随着时间的推移，30多年过去了，当前的体育资本市场较之以往更加活跃，奥运会的商业化气息有增无减。按照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要成为消费客体，物品必须符号化……物品转化为系统中的符号，这种变化也涵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即为消费关系”（Baudrillard, 1968, p. 277）。这种系统形成之后，大家就“处于‘消费’统治整个生活的局面”（Baudrillard, 1970, p. 23）。消费结构中的消费品系列，是一整套消费品之间存在的必然的有序性关联，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符号话语制造出来的暗示性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该编码相适应的竞争的、无意识的纪律来规训他们……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Baudrillard, 1970, p. 137）

在强大的资本利益驱使下，已经被过度商业化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得不做出各种妥协。美国 NBC 购买里约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费用高达 12 亿美元，几乎占到总转播权费用的一半，因此热门赛事便“自然而然”地服务于主转播商所在的国家。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期间，田径、游泳、体操等受到美国观众青睐的项目决赛被安排在美国电视的晚间黄金时段播出（魏伟，2015a）。为了确保收视率和广告效益最大化，与里约只有一个小时时差的美国依然选择延播奥运会开幕式。欧洲电视观众抱怨只能在午夜时分收看沙滩排球比赛，因为比赛被安排在美国西部时间 20:00 进行。羽毛球、乒乓球等中国运动员擅长的比赛项目被安排在中国的晚间黄金时段进行，因此羽毛球男单决赛以 7.08% 的收视率成为中央电视台里约奥运会收视率最高的单场比赛。进入淘汰赛阶段的中国女排的比赛在国内连续创造收视率新高，也与成功地避开了夜场比赛有较大关系。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期间，国内电视的收视量超过 6.5 亿人次。由于东道主韩国与中国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因此被放置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短道速滑各项比赛囊括了冬奥收视率的前 12 名，最高收视点出现在短道速滑男子 500 米决赛。尽管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同时段播出，但收视率仍然高达 1.53%，收视人群超过 2500 万。

奥运会期间，超级明星们自然得到了媒体的超级关注，媒介神话中的明星凝视几乎是约定俗成的（魏伟，2011）。迈克尔·菲尔普斯的奥运“二十三金传奇”，尤赛恩·博尔特的连续三届奥运“三金王”，游泳新王者莱德茨基和体操小将西蒙娜·拜尔斯的四金表现，内马尔率领巴西男足夺冠和内村航平卫冕体操全能王等突出表现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无限

□ 符号与传媒 (21)

放大。在里约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身上的拔罐印激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于是拔火罐开始引领西方民众消费新时尚。菲尔普斯 1.93 米的身高却有 2.03 米的臂展，使他可以完成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双手向后抱住自己后背的“菲鱼抱”，这在里约奥运会期间成为热门话题，继“反手摸肚脐”和“A4腰”之后被各国民众消费。显然，这一系列消费行为已经属于波德里亚的仿象三等级中的第三层级“仿真”（la simulation）（Baudrillard, 1976, p. 77）。体育迷热衷于消费自己崇拜的体育明星喜爱的商品和生活方式，这种消费的“超一致性”所呈现出的是他们对体育明星的戏仿。因此，即便是如球王马拉多纳、丹尼斯·罗德曼、保罗·加索尔等“坏小子”明星的消费方式也被拥趸们一并戏仿。这是当代消费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菲尔普斯在比赛中的“英雄”表现让体育迷彻底忘却了那个因吸食大麻而成为反面典型的青少年。

有趣的是，在里约奥运会上，新加坡泳坛新秀斯库林在比赛中击败了他昔日的偶像菲尔普斯，于是他于比赛 8 年前在新加坡与偶像合影的照片广为流传。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年轻人接近偶像，勇敢追梦，无疑更加迎合普通民众的消费观。

奥运会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让体育英雄和名流在商业大潮下应运而生。波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在比赛中获得胜利，运动员就激活了完整的价值体系，由此也换来个人的名誉地位”（Baudrillard, 1972, p. 262. 1）。但这种崇高化导致在过往奥运会绝大多数报道中普通运动员和失利运动员的集体缺席。波德里亚指出：

在现实的符号世界中，欲望是无法通过幽灵般的构造来满足的，反而可能会引来由欲望带来的可耻的失败。失利的运动员通过自己的方法质疑了价值交换系统，这一价值体系的形式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工薪阶层以及消费者的控制……这里存在的剥削与出卖劳动力一样严重，正是这种伪造的交换机制使得失利在无意识中迸发了。在这一意义上，每一个与那些“正常性”（这种正常性不过就是一种资本主义法则所构筑的氛围）相对立的“心理障碍”都可以进行政治性的解读。（Baudrillard, 1972, p. 262. 1）

因此，波德里亚得出的结论是，体育运动的意识形态是潜在规则以及强者规则的混合物（Baudrillard, 1972, p. 265. 1）。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掌控下，“失败者”也开始得到媒体和民众的“凝

视”，尤其是那些堪称经典的“失败者”。里约奥运会前夕，媒体消费的对象是美国射击运动员马修·埃蒙斯，他曾经连续三届奥运会在最后一枪将到手的金牌拱手相让，人们为他寻觅到的对应者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王皓，他曾连获三届奥运会男单亚军。在里约奥运会期间加入这个叙事序列的是马来西亚羽毛球运动员李宗伟。他曾连续两届奥运会决赛不敌林丹，里约奥运会上虽亲手挫败林丹，却在决赛中不敌另一名中国选手谌龙，从而“三连亚”。这一叙事延续了奥运会悲壮的“失败者”叙事模式。

事实上，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这类叙事的对象经常翻转成为主角。第七次参加奥运会的跳马女王丘索维金娜，里约奥运会难民代表团里的多名成员，无法代表祖国参赛，夺冠后无国旗、国歌相伴的科威特射击运动员，都属于这一个叙事组。默默无闻，从英雄的神坛跌落，或是本该成为英雄却失之交臂，这类叙事有着较为清晰的叙事框架，甚至有类似的情节和视角。这是里约奥运会叙事区别于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一大差异，这类被叙述者的领军人物是奥运开幕式点燃主火炬的巴西马拉松运动员范德莱·德利马，这位获得雅典奥运会铜牌的选手曾完美地诠释了遭遇意外痛失金牌却泰然处之的奥运精神。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能够比较精准地观照奥运“失败者”叙事，这在同类型理论中是不多见的。

二、西方体育中心化语境下的奥运去符号化

奥林匹克运动会源自西方文明中的古希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以西方体育为起点，因此西方体育中心化的格局由来已久。不仅在项目设置上，西方优势体育项目占据压倒性多数，在单项国际体育组织中，西方人也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从2010年之后的国际体育传播研究来考察，西方体育项目主导的趋向也比较明显（魏伟，2016）。那么，在东西方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奥运会上，东西方对于体育的认知和理解也存在不可小觑的差异。波德里亚在《邪恶的透明性》中提出的“他者”（l'autre）理论被一些文化学者运用于分析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与非西方体育文化的碰撞，这事实上是另一种层面的符号交换行为。“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殖民时期，西方殖民者把西方体育放置于殖民地并谆谆教诲非西方国家。在今天，非西方文化看上去更像是在消费西方体育，尤其是来自非西方的运动员在西方人公认的‘主流项目’中击败西方运动员的时候。”（Blain & O'Donnell, 2000, pp. 1 - 22）因此，无论是姚明、刘翔、李娜，还是马拉多纳、梅西、韩国女子高尔夫球群

□ 符号与传媒 (21)

体以及来自印度的顶尖板球运动员，总能够引起西方体育社会的高度重视，这实际上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体育传统理念造成的。“这些西方体育文化的‘他者’，无论他们的运动技巧多么高超，抑或是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欺骗技巧，无非是在消除东西方的差异，实质上仍然是在巩固西方体育文化的核心地位。”(Blain & O'Donnell, 2000, pp. 1 - 22)

在西方体育中心化的语境下，由体育引申出的符号现象层出不穷，对此，波德里亚给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实例。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上，世界级男高音歌唱家卡雷拉斯与现场12万观众就现场超大屏幕影像间的互动，像极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的名画《宫娥》。此时，“古典时期的目光游戏已经变成了电视视觉时代的眼光越位”(波德里亚, 2009a, pp. 69 - 70)。这种“越位”其实投射出的是符号的元语言冲突。当歌唱家面对自己在超大屏幕上的影像唱歌时，现场观众反而只能看到侧影，于是又将目光投向远到几乎无法辨认的歌手本人。体育的符号意义在于它能够将赛场上的暴力与现实中的纷争隔离开来。因此，在马岛战争中落败的阿根廷人能够通过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比赛中对英格兰的胜利获得异乎寻常的快感，甚至通过“上帝之手”这样的额外幸运提升这种快感消费。从符号学的视角来考察，奥运会各国和各地区奖牌榜的排名是想象暴力与消除冲突的符号隐喻，彰显着国家体育硬实力和软实力，乃至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魏伟, 2014a)。符号学家赵毅衡提出，软实力的实质就是符号实力。近年来，随着一些西方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奥运会奖牌榜的排名，奥运会奖牌榜日益成为展现国力的场域。里约奥运会奖牌榜排名前五位的美国、英国、中国、俄罗斯和德国恰好是国际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较大的五个国家，因此这层符号隐喻已经相当明显。这也许就是各国民众重新开始看重金牌和奖牌榜的深层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里约奥运会期间，多家媒体注意到中国民众不再只关注金牌，更多是在享受奥运带来的快乐。境外媒体纷纷指出，中国“去金牌化”的舆论趋势开始挑战“唯金牌论”，这是一种新境界。“令人失望的奖牌榜可能会刺激政府重新思考其奥运梦想。”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中国民众格外重视裁判的判罚和一些“非正常现象”。例如，女子4×100米半决赛中，美国队依靠申诉挤掉中国队而进入决赛，这一前所未有的实例被国内许多民众甚至不少专家解读为国家体育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较量的挫败。此外还有：拥有最高动作难度、具有夺金实力的女子高低杠选手范忆琳因为预赛早场被故意压低分数而无缘单项决赛，男子举重运动员吕晓军因为哈萨克选手疑似不成功的试举被判成功而痛失金

牌，女子举重选手黎雅君因为没能及时获知裁判改判而丢掉金牌，拳击选手吕斌在大家普遍认为应当获胜的比赛中被意外判负。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队遭遇多次不利判罚，让时任主教练李琰泪洒赛场。事实上，随着许多奥运比赛项目规则的日益透明化，对于比赛结果的解读已经不再单纯由以往小范围的仲裁组专家决定，而是会接受媒体和各国民众的“细读”，加上社交媒体的强势介入，这种每届奥运会上都普遍存在的争议判罚被人为放大，导致奥运“去符号化”现象一再上演。

奥运会是青年人的聚会，但在这场盛会中还是有许多不和谐的“去符号化”现象发生。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黎巴嫩代表团拒绝与以色列代表团同车前往开幕式现场，埃及柔道选手谢哈比失利后拒绝与以色列选手萨松握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鲜女子体操运动员洪恩珍接受韩国选手李恩珠的邀请完成合影自拍，这可能是众多不和谐元素中的一个反例。

波德里亚有关体育符号功能的阐述，在他的《赛车手与他的双重角色》一文中较为完整。这篇写就于1995年3月的文章集中论述了F-1车手的角色符号。在F-1这项“烧钱”的游戏中，车手和赛车都被推至极限，而二者是通过速度来协调的（Baudrillard, 2002, p. 166）。一辆赛车的好坏（所指）是由包括研发人员、技师、各种工作人员在内数以千计的人决定的，但最终的胜负（能指）只在车手一个人身上，因此，这是一种高度压缩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波德里亚的这一论述很容易让人想起罗兰·巴尔特在《什么是体育》中有关赛车比赛的“多重悖论说”（任文，魏伟，2011）。但波德里亚与巴爾特的观察视点不尽相同。波德里亚认为，“一级方程式赛车手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是精密仪器的自动终端，是一个机械师；另一方面他同时是观众热情和死亡冒险的符号操控者”（Baudrillard, 2002, p. 169）。对于F-1车迷而言，他们也时刻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希望比赛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不断看到各种意外和车手与死亡之间的博弈。“对于车队来说，他们也时刻处在投资与赠送礼品的矛盾之中。”这种符号意义的多重矛盾导致波德里亚得出了最后的结论：“F-1赛车比赛就是一个怪物，这种聚焦于技术、金钱、雄心和威信的东西是个十足的怪物。”（Baudrillard, 2002, p. 169）这个在技术上不断追求完美的怪物最终会毁掉这项运动，而且它还将在一定程度上“污染日常生活中的驾驶技术”（Smith, 2010, pp. 209-210）。

波德里亚对于商业意味浓重的当代奥运会的反讽是持之以恒的。为了与法国大革命两百年纪念相吻合，他故意将洛杉矶奥运会说成是在1989年举

行。“奥运会是一个完全的行为艺术，对国家的自我庆典的集体参与……（洛杉矶奥运会）一切都受赞助，一切都情绪高涨，一切都很干净，百分之百的广告活动。”（Baudrillard, 1986, p. 58）这显然是对作为商业奥运会开端的洛杉矶奥运会的极端戏讽。不仅如此，波德里亚还用反讽的方式讥笑了12年后再度在美国举行的奥运会和稍后进行的残奥会。“剩下的只有把性也变成奥林匹克的一个竞技项目：奥林匹克性运动会。如同在亚特兰大那样，还有与之平行的残疾人性运动会。”（波德里亚, 2009b, p. 47）显然，在这里，波德里亚并不是为了讥讽参加残奥会的残疾人运动员，而是针对夏季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相继在一个商业气息浓郁的地方举行这种劳民伤财的形式。

三、致命策略语境下的当代体育暴力

波德里亚在《致命的策略》中的《沉默的大多数的阴影》一文中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大众的论述。他认为当代社会不是由“社会王国”构成，而是由沉默的大多数组成的“大众”构成的。“群众退到沉默中之后，就不再充当主体，它不再被人们谈论、言说和代表，也不能经历政治的‘镜像阶段’和想象辨认的循环。人们看到其中的威力有多大。一旦不再充当主体，群众就不再被异化——既不能在它自身语言中，也不能在任何其他语言中。”（波德里亚, 2015, p. 135）大众并非主体的社会叠加，他们“是一群权力来自于沉默和看似被惯性所宰制的‘狡诈客体’”（Baudrillard, 1997a, p. 45）。“包括民意调查人、宣传工作者、政论家和社会学者都在试图解读大众，但大众却用‘致命的策略’——谋略、技巧和模棱两可的话语来搪塞这些主体，并保持一步的领先。”也就是说，在大众与政治力量的博弈中，大众处于小幅领先地位（Baudrillard, 1990a, pp. 82 - 88）。因此，政治的剧本被改写为：大众不再被政治力量唤醒，而是大众在决定政治的走向。当代资本主义精英阶层认为自己仍然控制着社会权力和影响，但那在波德里亚看来不过是“权力的幻觉……就像在镜中起舞（*danser devant un miroir*）”（Baudrillard, 1990b, p. 48）。“高层权力不是来源于领袖与现代解放，而是来源于让其他人永远处于怀疑的致命策略中。”（Baudrillard, 2007, pp. 116 - 118）波德里亚的大众理论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中大众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波德里亚尝试探讨体育以及体育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问题。在《沉默的大多数的阴影》一文中，他列举了1978年同时发生的两件事：从法国引渡回德国律师克劳斯·科洛桑特，引起几百人抗议；一场世界杯足

球赛的资格赛，引起两千多万人关注。多数法国知识分子谴责足球被来自大众的力量神秘地操控了。波德里亚认为，“大众对于足球的忠诚和痴狂是被给定的理想主义的，也是启蒙的，他们既没有被误导，也没有被魅惑”（Baudrillard, 1982, pp. 12 - 14）。因此，大众对体育的痴迷是社会现实造成的，并非孤立的社会现象。

波德里亚把体育场内的暴力称为“恐怖主义之镜，是潜在暴力的瞬间结晶”（Baudrillard, 1990a, pp. 82 - 88）。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英国学者理查德·朱利安诺蒂认为“足球流氓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看上去威胁到了政府对暴力的垄断，敢于通过在球场上制造令人瞩目的暴力景观来颠覆场上的比赛。与当代恐怖主义者一样，足球流氓的‘致命策略’意在诱使国家陷入对深层权力资源的揭露”（Giulianotti, 2004, pp. 225 - 239）。2012年2月1日发生在埃及塞得港的足球暴力事件，被专家和学者普遍解读为这个国家之前一年多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在足球场内的激化呈现。自波德里亚的《恐怖主义之镜》问世，几乎所有后来的有关足球流氓和体育暴力的研究都无法绕开他的这一研究。波德里亚将“海瑟尔惨案”界定为“安全的灾难性反讽”（Baudrillard, 1990b, p. 64）。98名球迷在赛场内所谓“安全”的护栏下遭到致命的伤害（“海瑟尔惨案”的实际死亡人数为39人），警察为了避免球迷冲入场内对赛事造成影响，竟然拒绝球迷冲出护栏逃生。这种所谓的“超保护”系统只会失去正常的防护功能而使事件滑向“恐怖的可逆性”（Baudrillard, 1990a, pp. 82 - 88）。

当然，波德里亚对“海瑟尔惨案”的定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舆论的影响。他将观众（尤其是英国球迷）指涉为“尝试角色翻转”的“另一种逻辑”，因为“他们把自己变成了演员，在媒介的凝视下篡夺了球员的主角地位，他们制造了自己的奇观”（Baudrillard, 1990a, pp. 82 - 88）。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现场的英国（利物浦）球迷其实也是受害者，警方的不作为是事件的重要诱发因素。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巴西体育迷的嘘声和喝倒彩似乎是要尝试角色翻转，不啻为里约奥运会的一道风景线。这与风靡2014年南非世界杯的“呜呜祖拉”有很大的差异。在东道主现场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嘘声中，法国撑竿跳高选手雷诺·拉维莱尼痛失金牌，在领奖台上失声痛哭。部分俄罗斯游泳运动员因曾服用兴奋剂而被喝倒彩，美国女足队员霍普·索洛因在赛前公开担忧寨卡病毒而被现场观众高呼“寨卡寨卡”。巴西观众嘘声和喝倒彩的对象主要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三个“体育大国”，以及巴西在南美洲的主要体育对手阿根廷。此外，巴西体育迷还在球场内对美国女

足球队员高喊“同性恋”。在巴西队与阿根廷队的男篮比赛中，现场球迷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和下流的手势“问候”阿根廷人。德国网球选手达斯丁·布朗在与东道主选手的网球比赛中不慎摔倒扭伤脚踝，竟然激起了现场球迷的一片叫好声。捷克队与巴西队的沙滩排球比赛中，现场的巴西观众不顾现场官员“不要发出嘘声”的请求，满场嘘声一片。在击剑这个要求相对安静的比赛中，巴西观众仍然用疯狂的嘘声来应和。当然，嘘声和喝倒彩声未必都能产生作用。中国女排便在现场观众贯穿始终的声浪中击溃两届奥运会冠军，巴西女排主帅吉马雷斯的孙子痛哭的画面成为里约奥运会的经典影像之一。

波德里亚还探讨过由足球暴力事件引发的“足球比赛魅影”现象。由于球迷闹事，1987年9月在马德里进行的皇家马德里队与那不勒斯队的欧洲冠军杯比赛被安排在一个没有球迷的空球场进行，但这场比赛仍然因为电视直播而让全球的观众目睹。这可能是后现代体育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亲历比赛，但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画面。体育成为了一项纯粹的赛事……事实上缺乏任何依据，很容易被合成的图像所取代。”（Baudrillard, 2008, p. 8）这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竞赛型演示叙述中观众的强大力量（魏伟, 2015b）。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举行的绝大多数体育赛事都是空场进行，波德里亚的“足球比赛魅影”现象成为常态。赛场赛事和媒介赛事叠合的当代体育赛事成了纯媒介赛事，凸显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今天，类似奥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奇观”赛事能够吸引到几十乃至上百亿人次的观赏，但真正能够到现场观看比赛的人是极其有限的。“足球比赛魅影”现象更多涉及的是后文将谈及的超真实理论。

四、伴随文本执着语境下的文本翻转

波德里亚在晚年开始提出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理论。例如他在《海湾战争不曾发生》中提出“我们看到的海湾战争不过是媒介呈现的一场虚拟战争，真正的战争根本不曾发生”（布希亚, 2003, p. 24）的惊人观点，饱受争议。他指出，“当战争进入新闻，已经不再是一场实在的战争，而变成一场虚拟的战争，也就是症候般的战争。就像一切经过心理机制的，都成为无止尽镜映的对象，所有透过新闻运作过的，都成为无止尽炒作的对象，一种全然不具确定性的场域”（布希亚, 2003, p. 49）。这一观点在当时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反驳，不少学者甚至以此来攻击后现代主义。克里斯托弗·诺里斯认为，这一系列荒谬的观点“暴露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在智力与政治上的破

产”，见证了“西方知识分子因为极端反现实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而陷入道德与政治上的危机”（Norris, 1992, pp. 11 - 31）。但美国语言学家诺阿·乔姆斯基等却公开表达了对波德里亚观点的认同。

根据波德里亚的观点，法国学者让-菲利普·杜桑就2006年德国世界杯决赛中令人震惊的“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事件”进行了阐释：“齐达内的行为，很难察觉，令人费解，更像是没有发生过的奇观现象。如果一个人在体育场内限制了自己的行为，让其他人没有察觉到，观众和裁判也没有当场目睹，那么这个行为根本就没有发生过。”（Toussaint, 2007）杜桑的观点当然是“海湾战争不曾发生”理论的实际运用。波德里亚甚至还提道，“在媒介时代，事件如果没有经过电视和广播的‘实时直播’就等于没有发生”（Baudrillard, 1995a）。但杜桑并不知道，波德里亚本人就“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事件”有过较为详尽的评论，载于其逝世三年后出版的《嘉年华与食人族》一书中。波德里亚对这位同胞球星没有为法兰西带来第二座大力神杯的行为毫不宽容，他指出：

齐达内的举动是对世俗身份认同仪式的毁灭……他让整个决赛从表演的高潮达到功能障碍的高潮，他以华丽的举动来反对美好的事物，瞬间在全球化的中心突出地证明了虚无。这个简单的举动在任何意义上投射出的都不是一种反抗的态度。有人会说这个举动超出了个人主体意识的范畴，是来源于身体之外。这是导致整个系统被瞬间愚弄的高潮部分……齐达内的这一举动就是恐怖主义行为。（Baudrillard, 2010, pp. 76 - 84）

显然，波德里亚并不认为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的动作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举动虽然逃过了当值主裁判和绝大多数现场观众的视线，甚至没有被转播机构HBS的常规镜头捕捉到。但转播机构用于制作纪录片的“明星机位”全程捕捉到这一时刻，因此这组镜头立即被激活并在转播中反复播放。于是，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本来“应该没有发生过”的瞬间。更有不少新闻媒体赛后请到唇语专家，通过齐达内和马特拉齐的嘴型来解读当时可能发生的对话。一个细节改变了一届世界杯冠军的归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世界对一位传奇足球明星生平的认知。这看上去既是一个提喻，又像是一个有趣的反讽。

为了更好地考察文本与文本外的意义流变，在克里斯蒂娃和热奈特的理论的基础上，赵毅衡提出了全套“伴随文本”的概念。伴随文本可以分为副

□ 符号与传媒 (21)

文本、型文本、先后文本、前文本、评论文本和链文本等。在当今社会中，伴随文本越来越去边缘化，成为主导文本形式和内容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忍受不了某一种伴随文本过分明显地控制解释，我们也摆脱不了伴随文本的普遍控制。”（赵毅衡，2016，p. 154）“伴随文本执着”成为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随着社交媒体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伴随文本的作用益发彰显。傅园慧的意外走红即源自在赛场边接受的采访，“洪荒之力”成为深刻影响2016年中国流行文化的重要词汇。跳水运动员秦凯对何姿的求婚仪式成为轰动世界的头条新闻，冠军选手施廷懋反而在场边成为陪衬。有趣的是，这场“现场直播”的求婚仪式中的单膝跪地、送求婚戒指的元素都是西式的。被求婚的还有马术赛场上的英国选手夏洛特·杜雅尔丹，她的未婚夫用T恤上“现在你愿意嫁给我吗？”的方式实现了求婚。赵帅、郑姝音情侣搭档双双夺冠，“赵帅是郑姝音的搭档”“身高不及女友”等文本评论压倒了赛事本身的相关报道。与此类似的还有羽毛球运动员谌龙与女友王适娴夺冠后的高调示爱，射击运动员庞伟与妻子杜丽这对“神枪侠侣”，跳水奥运五金得主吴敏霞与男友的互动等。这些评论文本深度满足了受众对于彼时热点人物信息缺失的遗憾，不仅主导了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甚至还深刻影响了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方式和议程设置。

事实上，伴随文本的影响力经常被提升至国家层面。澳大利亚游泳选手马克·霍顿在击败孙杨后，指责孙杨是“服用兴奋剂的小人”，随后又解释称这是一种战术。这一套伴随文本涉及副文本、评论文本和链文本等环节，引发了两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的冲突。随后法国游泳选手卡米尔·拉库尔也在采访时抨击“孙杨的尿是紫色的”，与霍顿的言论形成“组合拳”，这甚至引起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泳联的高度关注。2020年孙杨被国际仲裁法庭CAS宣布禁赛8年竟然成了这一事件伴随文本翻转的注脚。郎平带领中国女排夺冠激发了排球迷的群体记忆。她以运动员的身份率领中国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夺冠，又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排球解说员身份解说中国女排夺冠，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带领美国女排击败中国队，这些前文本渊源都被挖出。美国游泳名将、12枚奥运奖牌得主瑞安·罗切特因为报假案使“整个国家蒙羞”。这些伴随文本不再是奥运会的“佐料”，有的甚至直接影响了文本——比赛的结果。这可能是波德里亚没有预料到的。

五、超真实语境下的媒介奇观赛事

类似奥运会和世界杯能够吸引全世界目光和媒介高关注度的赛事被称为

“媒介奇观赛事”。媒介化转向是体育传播学近年来最显著的转向之一，它集中体现在“体育重大事件”这一概念的引入（魏伟，尚希萌，2020）。学者马丁·穆勒根据一系列指数，把体育赛事分为巨型事件（giga-event）、重大事件（mega-event）和主要事件（major-event）（Müller, 2015, p. 636）。奥运会属于巨型事件。美国学者史蒂夫·雷德海德就是运用波德里亚的理论，对1994年美国足球世界杯进行了考察，得出了世界杯“就是一届全球媒介赛事：一个没有真正参考的仿像和超真实的奇观”（Redhead, 1994, pp. 291 - 309）的结论。媒介奇观赛事的叙述框架是多元的，这与普通的竞赛型演示叙述有根本的区别（魏伟，2015b）。根据报道，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传统电视频道转播了125000小时的比赛，比2012年伦敦奥运会提高25%，全世界有近50亿人观看了里约奥运会的比赛，创下纪录。

波德里亚关于拟像和超真实的观点，在传播研究领域，尤其是电视体育赛事转播的研究中运用得十分广泛。他认为，西方社会业已进入超真实时代，超真实包含了对现实的集约化。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拟仿物，超真实让现实看上去“比真实更真实”。用波德里亚的“内爆”观点来看，“传播与意义所产生的拟像与超现实的过程，比真实更加逼真。因此，真实被内爆掉了……在真实中，媒介自身也内爆了。在某种超真实的星云中，媒介与真实都内爆了”（Baudrillard, 1981, pp. 119 - 124）。波德里亚指出，“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就好像这些东西都已贪婪地照过镜子，自认为已变成了透明的，全体在自己体内就位，在充足的光线下，被实时地、毫不留情地复制”（Baudrillard, 1995b, pp. 18 - 19）。他曾经列举过的情色产品、迪士尼乐园和高保真音响等都是超真实的现实呈现。具体到电视体育转播领域，“真实场景模型的生产都是以（NBC对奥运会）过往制造模型的拟仿作为参考的。因此，NBC对奥运会的模式化生产就是媒介文本被内爆、再模式化的生动事例，是对现实的‘混账’阐释”（Andrews, 1998, pp. 5 - 18）。在今天的奥运会转播中，虚拟现实的现场广告板、模拟世界纪录的实时动态线、VR转播带来的360度视角的沉浸式图像一一验证了波德里亚的预言。

波德里亚曾经准确地预言了作为声画结合的电视在传播中的统治地位：“我们将持续寻找比传播更为迅捷的东西：挑战它，与它决斗。传播的速度过慢，它通过接触和言语来达成，是慢的代名词。目睹当然更快，它是媒介的渠道，是最快速的一种。所有事物都在瞬间呈现。”（Baudrillard, 2008, p. 8）作为仿像的当代体育赛事转播给受众带来的超真实感，已经远远超越了

□ 符号与传媒 (21)

在赛场边现场观众的感受。各种视角、各种速度、各种高清的画面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求；埋在沙坑里和别在裁判员腰间的麦克风让受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正如波德里亚所言，“电视的扩散进入了生活，生活的扩散进入了电视”（Baudrillard, 1983, p. 21）。为此，他感叹，“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再知道历史从新闻中的恶化到技术上的完美都历经了什么，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再知道模具从消失到完成中都发生了什么”（Baudrillard, 1987, p. 26）。超真实的再现覆盖了真实事件，以至于人们无从知晓现实究竟发生了什么。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成为历史上首届“第二屏幕”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实现了3D转播，被称为“数字”奥运会；2014年索契冬奥会成为“社交媒体”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首次用VR技术进行赛事直播；2018年平昌冬奥会实现了5G传输；为了准备东京奥运会，日本NHK电视台提前开始试用8K转播技术；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使用云端转播技术。新技术的规范化和转播媒体的连贯性让媒体中的奥运呈现出标准化的样态。画面中的里约奥运赛事与北京奥运和伦敦奥运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异。新技术甚至可以让空场的比赛充满假观众和仿真度极高的观众喝彩声。但事实上，除了满场的嘘声和喝倒彩声，奥运会的独特性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这是由拟仿先在的媒介技术决定的。

波德里亚认为，“电视传媒通过其技术组织所承载的，是一个可以任意显像、任意剪辑并可用画面解读的世界的思想（意识形态）。它承载着的意识形态是，那个对已变成符号系统的世界进行解读的系统是万能的”（Baudrillard, 1970, pp. 189 - 190）。电视体育转播带来的超真实感经常给人虚幻的感觉，正如我们在看3D、4K和VR转播时常常会有目睹电子游戏的错觉。媒介体育赛事可能是对体育人物和事件的误读，也可能是对体育文化内涵的曲解（魏伟，2019）。奥运会游泳和田径比赛转播中由计算机模拟出的世界纪录线和运动员代表的国旗或队旗时常被部分受众认为是赛场里客观存在的。美式橄榄球比赛场内五彩斑斓的线条和特技虚拟出的线条交织在一起，有时连较为专业的体育迷也无法辨认。由GPS技术主导的F-1和纳斯卡赛车比赛转播几乎成了统计学领域的恶斗，千分之一秒的差距和从一档到七档的变化被肆意放大。对此，波德里亚告诉我们，“虚拟现实是真实世界的对极。高清晰度是现实高度稀释的代名词。媒介的高清晰度往往对应着信息的最低精度。信息的最高精度对应着事件的最低精度”（Baudrillard, 1997b, p. 26）。奥运会上媒介技术的不断提升，不过是波德里亚的超真实感理论增添一个又一个注脚。人机结合的“赛博人”是否会主宰今后的职业赛事甚至

是奇观赛事？体育比赛还需要人类的具身判罚吗？人本主义是否应当从体育赛事中退场？这些都在短时间内成为可以探讨的话题（Wei & Shang, 2020）。

六、结语

波德里亚对于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向具有前瞻性。他曾指出，“我们时代的歇斯底里性格的根源在于，真实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歇斯底里”（Baudrillard, 1981, p. 41）。波德里亚对于虚拟现实和高清晰度发展的研判是基本准确的，但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却使他有关电视将长时间主宰体育媒介市场的预言产生偏误。根据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媒介报告，早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时，使用双屏收看奥运会的人数就已经两倍于单纯收看电视的人数。根据NBC发布的数据，里约奥运会期间，2.27亿脸书用户发表15亿条帖子，推特用户发表1.87亿推文，吸引了750亿次浏览量。反观美国日平均电视观众人数，却从伦敦奥运会的3300万人跌到2790万人。这似乎证明了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已经在逐渐超越电视。但NBC表示，这场社交媒体的胜利有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自己。脸书上奥运视频6亿多的浏览量，最初的来源就是NBC。德国Statista公司的研究表明，91%的年轻人会一边看电视，一边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第二屏幕。尼尔森的报告显示，电视媒体是中国受众观看奥运会的主流渠道，83%的中国人通过电视观看奥运会，67%使用手机观看，其中有大量的用户是双屏同时观看。因此，电视在奥运会期间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并没有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波德里亚的诸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重要文本。美国体育社会学者劳伦斯·文内尔运用波德里亚的理论，通过对超媒介、超商品化和超现实的后现代体育酒吧的空间地理学考察（Wenner, 1998, pp. 301 - 332），奠定了之后“脏言”理论的基础。英国学者加里·万内尔利用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了媒介体育明星制造过程中电视转播权、赞助商和娱乐市场的关系（Whannel, 2002）。学者罗布·范文斯伯格和伊安·里奇也将波德里亚的理论作为基础，对奥运五环标志进行了后现代符号学研究，认为五环标志成了一个超商品化的能指（Van Wynsberghe & Ritchie, 1998, pp. 367 - 384）。美国学者约翰·贝尔在研究了波德里亚的大量理论后，认为这些理论能够“成为今后环球流行文化大部分机器的引擎”（Bale, 1994）。法国学者热内维埃夫·雷勒可能是把波德里亚的理论最多运用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后现代体育是后现代社会文化的生产者 and 再生产者，是过

□ 符号与传媒 (21)

度消费的特权客体” (Rail, 1998, pp. 143 - 161)。英国学者朱里亚诺蒂和瑞士学者克劳泽在对体育重大赛事和恐怖主义的梳理中运用了波德里亚的恐怖主义之镜的观点 (Giulianotti & Klausner, 2012, pp. 1 - 17)。加拿大学者阿特金森和凯文·杨对波德里亚的十本著作进行了系统分析, 在对体育奇观和体育恐怖主义的研究中将波德里亚的超真实和非事件理论作为核心加以论述 (Atkinson & Young, 2012, pp. 1 - 21)。澳大利亚学者大卫·洛弗在对“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事件”引发的媒介、体育与种族化的探讨中也使用了波德里亚的非事件理论 (Rowe, 2010, pp. 355 - 371)。笔者在梳理了波德里亚有关符号的理论体系以后, 将其列为影响体育符号理论发展的四位先驱之一 (魏伟, 2012)。在西方体育文化研究这一维度, 波德里亚的体育思想也是三大学派中法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理论 (魏伟, 2014b)。波德里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学者, 不同于其他法国学者理论的晦涩, 他的理论相对清晰, 但也充满偏激的观点。正如雷德海德所言, 运用波德里亚的理论进行体育社会学研究, “需要相当小心和慎重” (Redhead, 1994, pp. 291 - 309)。但近十余年的相关研究中, 能够完全摆脱波德里亚理论的并不多。

引用文献:

- 波德里亚, J. (2009a). 冷记忆3: 断片集 (张新木, 陈旻乐, 李露露,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波德里亚, J. (2009b). 冷记忆4 (张新木, 陈凌娟,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波德里亚, J. (2015). 艺术的共谋 (张新木, 杨全强, 戴阿宝,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布希亚, J. (2003). 波湾战争不曾发生 (邱德亮, 黄建宏, 译). 台北: 麦田出版公司.
- 任文, 魏伟 (2011). 奇观体育与体育奇观: 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体育赛事观. 体育科学, 11, 85 - 93.
- 魏伟 (2011). 解读神话: 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的符号学研究. 中国体育科技, 2, 47 - 51.
- 魏伟 (2012). 体育符号研究的发展述评.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8, 1 - 6.
- 魏伟 (2014a). 符号学视角下体育与软实力的关系.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6, 69 - 74.
- 魏伟 (2014b). 西方体育文化研究的流派辨析.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 12 - 14.
- 魏伟 (2015a). 重访电视与体育的“天作之合”: 从布尔迪厄说起.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 33 - 39.
- 魏伟 (2015b). 叙述公正与叙述惊喜: 竞赛型演示叙事研究. 符号与传媒, 1, 91 - 103.
- 魏伟 (2016). 近年来国际体育传播的转向和趋向. 体育科学, 5, 10 - 17.

- 魏伟 (2019). 解构当代体育媒介赛事的权力迷思: 基于约翰·费斯克的视角.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1, 72 - 79.
- 魏伟, 尚希萌 (2020). 体育传播学的媒介化转向: 从媒介体育到体育重大事件. 未发表论文.
- 赵毅衡 (2016).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Andrews, D. (1998). Feminizing Olympic reality: Preliminary dispatches from Baudrillard's Atlanta,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1, 5 - 18.
- Ashley, D. (1997). *History without a Subject: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Atkinson, M., Young, K. (2012). Shadowed by the corpse of war: Sport spectacles and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3, 1 - 21.
- Bale, J. (1994). *Landscapes of modern sport*,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audrillard, J. (1968).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aris: Gallimard.
- Baudrillard, J. (1970).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Ses mythes ses structures*. Paris: Denoël.
- Baudrillard, J. (1972).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aris: Gallimard.
- Baudrillard, J. (1976).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aris: Gallimard.
- Baudrillard, J. (1981).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Paris: Galilée.
- Baudrillard, J. (1982). *A l'ombre des majorités silencieuses ou la fin du social*. Paris: Denoël.
- Baudrillard, J. (1983). *Simulations* (Paul Foss,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audrillard, J. (1986). *Amérique*. Paris: Grasset.
- Baudrillard, J. (1990a). *La transparence du mal: Essai sur les phénomènes extrêmes*. Paris: Galilée.
- Baudrillard, J. (1990b). *Cool memories II (1987 - 1990)*. Paris: Galilée.
- Baudrillard, J. (1995a). The virtual illusion: Or the automatic writing of the world.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4, 97 - 107.
- Baudrillard, J. (1995b). *Le crime parfait*. Paris: Galilée.
- Baudrillard, J. (1997a). *Le paroxyste indifférent*. Paris: Bernard Grasset.
- Baudrillard, J. (1997b). Aesthetic illusion and virtual reality. In Nicholas, Z. (Ed.). *Jean Baudrillard: Art and artefact* (Nicholas, Z., Trans.). London: Sage.
- Baudrillard, J. (2002). The racing driver and his double. In *Screened out* (Turner, C., Trans.). London: Verso.
- Baudrillard, J. (2007). *Forget Foucault* (Dufresne, N.,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 Baudrillard, J. (2008). *Fatal strategies* (Beitchman, P., Trans.). New York: Semiotext(e).
- Baudrillard, J. (2010). *Carnival and cannibal, or the play of global antagonism* (Turner, C., Trans.). London: Seagull Books.

□ 符号与传媒 (21)

- Best, S. & Kellner, D. (1991).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Basingstoke: Guilford Press.
- Blain, N. , & O'Donnell, H. (2000).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media sport,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l identities: A “Postmodern” debate? *Culture, sport, society*, 2, 1 –22.
- Giulianotti, R. (2004). The fate of hyperreality: Jean Baudrillard and the sociology of sport. In Giulianotti, R. (Ed.). *Sport and modern social theoris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iulianotti, R. , & Klauser, F. (2012). Sport Mega-event and “Terrorism”: A crit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3, 1 –17.
- Kellner, D. (1989).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vin, C. (1996) . *Jean Baudrillard: A study of cultural metaphysics*. Hertz: Harvester Wheatsheaf.
- Müller, M. (2015). What makes an event a mega-event? Definitions and sizes. *Leisure studies*, 6, 627 –642.
- Norris, C. (1992). *Uncritical theory: Postmodernism, intellectuals & the Gulf War*. An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Rail, G. (1998). Seismography o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Three theses on the implosion of sport. In Rail, G. (Ed.). *Sport and postmodern times*.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edhead, S. (1994). Media culture and the World Cup: The last World Cup. In Sudgen, J. & Tomlinson, A. (Eds.). *Hosts and champions: Soccer cultures,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USA World Cup*. Aldershot: Arena.
- Rowe, D. (2010). Stages of the global: Media, sport, racialization and the last temptation of Zinedine Zidane,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3, 355 –371.
- Smith, R. (2010). *The Baudrillard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Toussaint, J. – p. (2007). Zidane’s melancholy, *New formations*, 1.
- Wei, W. , & Ximeng, S. (2020). Illusion or reality?—A semiotic phenomenology analysis of the “electronic justice” of contemporary sports events, *IAMCR Annual*, Helsinki.
- Wenner, L. (1998). In search of the sports bars: Masculinity, alcohol, sports and the mediation of public space. In Rail, G. (Ed.). *Sport and postmodern times*.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Whannel, G. (2002). *Media sport stars: Masculinities and mor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Willis, p. (1990). *Common culture: Symbolic work at play in the everyday cultures of the young*.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Van Wynsberghe, R. , Ritchie, I. (1998). (Ir)relevant ring: The symbolic consumption of the Olympic logo in postmodern media culture. In Rail, G. (Ed.). *Sport and postmodern times*,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作者简介:

魏伟,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传播、符号学等。

Author:

Wei Wei, Ph. D.,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sports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etc.

Email: wwei@bfsu.edu.cn